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

扁担挑出的长征

□ 罗俊昊 阙伟康

儿童文学作家朱良燕的小说《超级大秘密》里，有一个“三船钨砂”的故事：红军长征前夜，三船珍贵的钨砂被悄悄藏进白鹅乡梓坑村的山沟里，白军连长“小油头”扮作货郎进村打探，却被一个叫呼噜贝的孩子耍得团团转。

顺着文学的描述走进历史。会昌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及多位亲历者口述证实，1934年底，留守赣南的红军确实在梓坑村藏过一批钨砂。这批钨砂背后，藏着一家被誉为“共和国第一国企”的钨矿公司，一条由两千多块青石板铺成的秘密运输小道，还有一段用扁担和箩筐挑出来的革命奇迹。

要读懂这个奇迹，先得弄清楚：钨砂究竟是什么？钨，熔点高达3422℃，是所有金属中最硬的“硬骨头”。金属钨既可作灯泡里纤细的灯丝，更是大炮、坦克、穿甲弹不可或缺的“工业牙齿”。20世纪30年代，谁掌握了钨，谁便扼住了军工命脉。

而赣南，恰恰是一块得天独厚之地。作为“世界钨都”，此地现今钨矿储量占全国的70%、全世界的60%。于都、会昌、安远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，蕴藏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钨矿脉。那时市场上，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，而苏区一个农民辛苦一年，收入也不过十几块银元。

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心知肚明。他们对中央苏区布下了密不透风的经济封锁——盐进不来，布进不来，药品进不来，连老百姓做饭的锅都成了稀缺品。红军要生存，要打仗，就必须用钨砂去换物资。可钨砂藏在深山，且敌人虎视眈眈，红军要如何破局？

1930年4月，毛泽东率红四军转战赣南，在会昌县城驻扎下来。在此期间，一个叫刘义顺的年轻人带着300多名群众，连夜从盘古山赶来投奔红军。

刘义顺是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，本名徐复祖。在盘古山特委工作报告会上，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丰田、仁风山等地钨矿的开采情况、矿工的悲惨生活，以及美、英、德、日等资本家如何在这里掠夺资源。

会议持续了整整两天。会后，毛泽东挥笔写就两篇重要文献，其中一篇就是《仁风山及其附近》——这是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工业和产业工人所作的第一份调查报告。在这份报告中，毛泽东敏锐地指出：盘古山的钨矿，是苏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，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1931年，红军进驻铁山垅，建立了“公营铁山垅钨矿”。1932年2月，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，中华钨矿公司于于都丰田的大窝里正式成立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矿业领域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，公司首任总经理叫胡功克。但真正让它脱胎换骨的，是后来接任的那个人——毛泽民。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，时任中华

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、财政部部长。1932年秋末冬初，他受命兼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。

这位“红色管家”一上任，就把党支部建在了企业里。他又三上仁风山，冒着风雪挨家挨户动员，在秀娥祠堂门口召开群众大会，告诉大家：钨砂是红军的命根子，运出去就是打胜仗。之后，毛泽民组建了“仁风山钨矿合作社”，下设7个大组、130个工棚作业组，组织起几乎整个仁风山上的矿工为红军开采、运输钨砂。

矿采出来了，怎么运下去？这才是最大的难题。仁风山的采矿点海拔近千米。从山上的竹山坪、坑口到山下的钨砂仓库，没有宽敞的道路，没有车马，只有陡峭的山坡和密密的树林。而唯一的通道，是一条用两千多块青石板铺成的石阶路。它从仁风村山脚下蜿蜒而上，一头扎进云雾缭绕的山顶。

这条路，后来成了红军的“秘密运输小道”。每日天不亮，运输队员们就挑起竹篓，装上沉甸甸的钨砂，沿着湿滑的石板路往山下走。一担钨砂一百多斤，压在肩上，走一趟要两三个小时。身侧是深渊，头顶是密林，稍有不慎就会摔下悬崖。但他们不敢停。山下有白军的眼线，山上有敌人的探子，运输只能选在清晨和傍晚，借浓雾和夜色作掩护。日子久了，青石板上被踩出了浅浅的凹痕，那是无数双脚和一百多斤的重量，一天一天碾出来的。

村民们也发明了许多“土办法”：有的把钨砂藏在猪牛栏的草堆下，有的装进棺材假装出殡，有的混在木炭里用驴驮出去。这些朴素的方法，一次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把钨砂运了出去。

这些挑出深山的钨砂，最终去了哪里？答案是：换成了红军急需的药品、食盐、布匹和武器弹药。

在这一链条中，广东军阀陈济棠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。他控制着广东的出海口，既需要钨砂换取德国军火，又不敢公开得罪蒋介石。红军看准了这一点，通过秘密渠道与陈济棠做起了“钨砂生意”。

1933年至1934年间，纳粹德国驻华代表汉斯·克兰与陈济棠先后签订总额达2亿马克的易货协定，以中国的钨砂换取德国军火和工业设备。红军手中的钨砂，正是通过一套隐蔽的贸易体系流入粤军之手。1933年4月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中央对外贸易局江口贸易分局，负责组织对外进出口贸易，承担了当年中央苏区70%的对外贸易额。当时，中华钨矿公司将钨砂运至会昌白鹅挑沙厂加工成钨精矿，再由江口分局用货船运出，转运至广州、香港出口。

与此同时，通过上海的外贸渠道，苏区的钨砂还被秘密销往苏联，换回了无线电设备、医疗用品等战略物资。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，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



砂约7890吨，创造了约620万银元的财富。这笔钱，占当时苏区财政总收入的70%。

也就是说，红军每花10元钱，就有7元钱来自钨砂。而钨砂的贡献，远不止于“养家糊口”。它还在最要紧的关头，为红军挤开了一条突围的缝隙，也为万里长征准备了盘缠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各部从四面八方赶往于都河畔。毛泽民率领的第十五大队，正把苏维埃的全部家当打包装担——上百副挑子，装着两担黄金、几十担银元、几十担纸币，还有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。这支队伍被视作中央红军的“命根子”，前后左右都有部队死死护住。而那些沉甸甸的担子，很大一部分正是此前两三年间钨砂贸易攒下的家底——它们是长征路上最靠得住的经费来源。

出发前一个月，凭借与广东军阀陈济棠长期保持的钨砂贸易关系，周恩来、朱德委派何长工、潘汉年，在寻乌县罗塘镇与粤军代表秘密谈判。双方达成五项协议，其中最要紧的一条是“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”。正是这份协议，让红军在突围之初得以避开粤军主力，从第一、第二道封锁线相对顺利地穿过。不妨这样说：若无钨砂这根经济纽带，红军能否如此顺利地冲出包围圈，依然是未知数。

于都，正是这一切的交会点。这座小城不仅是八万六千名红军最后的集结地，更是整个钨矿经济的“心脏”——中华钨矿公司就坐落在它的铁山垅镇上。

1934年12月4日，项英率苏区中央政府从瑞金迁至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——这里三面环水，易守难攻，一万六千多名留守干部战士选中了它作为驻地。中央总供给部、国家银行、红军运输连、《红色中华》印刷所等机关均迁入村中。

一同被转移过来的，还有苏区最后一批家底——正是朱良燕笔下“三船钨砂”的原型。这几船钨砂，是留守红军最后的“命根子”。他们要用它换取粮食、药品，在深山密林中坚持下去。中央运输连的三名战士，奉命守护这批钨砂。他们将钨砂藏在猪牛栏里、地窖中，与敌人周旋。当地百姓也拼死掩护，没有一个人泄露秘密。

然而，1935年元宵节刚过，敌军还是嗅到了气味，突袭了梓坑村。钨砂被搜出，三名战士被捕。在被押运的船上，他们趁敌不备，毅然与敌船同归于尽——用生命践行了“人在，钨砂在”的誓言。

九十多年过去了，那条用两千多块青石板铺成的秘密运输小路，依然藏在盘古山的崇山峻岭之间。从仁风山的青石板路到于都河畔的扁担银行，这条弯曲小径告诉我们：那些不为人知的经济活动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（压题图为位于于都县铁山垅镇的中华钨矿公司旧址，由罗俊昊摄）

砚边吮毫

寥寥数笔，何以抵达四百年？

□ 王菲扬

回洛彩矶之前，又有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这一次，专程飞往南昌，只为看八大山人的特展。原本以为，看一次就够了。没想到两天之内，我三次走进八大山人的世界。第一次是初见，第二次是觉得没有看够，到了第三次，我已经不再急着寻找所谓的名作，只是在那些鱼、鸟、荷、石、竹与枯木前，一遍遍地看。

2026年，适逢八大山人朱耆诞辰四百周年。四百年是很长的时间，足以让王朝更迭，让城市变迁，让无数人的姓名消失在历史深处。然而，一个生活在十七世纪的画家，几只鸟、几尾鱼、一枝荷、一块石，直到今天，依然让人愿意跨越山河，专程去看。这件事本身就令我好奇：寥寥数笔，何以抵达四百年？

八大山人的画，第一眼往往是“少”。一只鸟立于石上，一尾鱼游于空白，一枝残荷斜出纸面。没有繁复的背景，没有刻意的铺陈，甚至常常空得令人意外。然而，看得越久，越会发现他的“少”并不简单。真正的简，从来不是少画几笔，而是在知道可以画什么之后，懂得什么不必再画。

八大山人显然懂得“舍”，舍去繁复的物象，舍去无关的装饰，舍去对于形似的执着。最后留下来的，可能只是一根线、一团墨、一双眼睛。但恰恰是这一双眼睛，让一只鸟有了性格，让一尾鱼有了精神。

八大山人的鸟，是中国绘画史上极为特别的存在。它们有时缩颈，有时孤立，有时斜着白眼望向世界。后人常常试图从这些眼神里寻找故国之思、愤懑与孤傲。或许都有，或许又不止于此。

艺术真正动人的地方，恰恰在于它没有把答案说尽。一只鸟在那里。四百年前，它看着朱耆的世界；四百年后，我们站在它面前，又仿佛被它反过来凝视。于是，画中的鸟不再只是鸟。它成了一个生命。

我尤其喜欢八大山人的荷。荷花在中国绘画史上并不少见，但八大笔下的荷，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孤清。一茎、一叶、一花，在大片空白之间生长。墨落之处很少，

天地却很大。

在江西省博物馆，面对原作，这种感受尤其强烈。隔着展柜玻璃，数百年前的纸本已经泛黄，淡淡、枯润、疾徐，都在真实的纸面上留下痕迹。那些没有落墨的地方，也因此真正显现出它们的分量。

中国书画讲究“计白当黑”。八大山人的空白，并不是画面剩余的部分。空白本身就是画。不画水，却让人感觉到水；不画风，却让人感觉到风；不画孤鸟，却让人感到孤独。水可以在那里延伸，云可以从那里经过，风也仿佛可以穿过纸面。观看者自己的经验、情绪与想象，也因此获得了进入作品的空间。

我越来越觉得，中国画真正困难的地方，有时不是如何画，而是何时停笔。一笔之后，要不要第二笔？一片荷叶旁边，还需不需要另一片？天地如此辽阔，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填满？八大山人的答案，是留下空白。

而四百年后的我们，恰恰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没有空白的世界。手机被信息填满，时间被行程填满，眼睛被图像填满。我们拥有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多的观看，却未必真正看见了更多东西。因此，再看八大山人，他忽然显得如此现代。他的“现代”，并不只是因为他的画在形式上与某些现代艺术产生遥远的呼应，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成立的问题：一个人的精神，究竟需要多少东西才能成立？也许，并不需要很多。一只鸟就够了。一枝荷就够了。一块石头，也够了。当然，如果只把八大山人理解为“极简”，仍然远远不够。笔墨背后，是一个真实活过的人。

朱耆生于明宗室。王朝覆灭之后，原有的身份与世界随之改变。他一度削发为僧，在佛门中度过了生命中重要的一段时期。后来虽然还俗，但那段修行经验，或许早已进入他的观看方式，也进入了他的笔墨。因此，再看八大山人的“少”，我常常会想到禅。禅并不是简单的空，也不是刻意营造的冷寂，而是在不断放下之后，重新看

见事物本来的样子。一枝荷就是一枝荷。

一块石就是一块石。一只鸟只是停在那里，却又仿佛已经说了许多。

也因此让我感到，八大山人的留白不仅是一种构图方式，更像是一种精神空间。画到这里，可以停了。话说到这里，也可以不再说了。那些没有被画出来的水、风、天空与远方，并没有消失，反而因为“不画”而获得了更大的存在。也许，这正是他的画中最接近禅意的地方：不用笔墨解释世界，而是在笔墨停止的地方，让世界自己显现。

再看八大山人的书法，也有相似的气味。他的字也有一种生拙、疏宕的气息。尤其当题款进入画面，字与画便很难真正分开：一边是孤鸟、枯荷与顽石，一边是那些或疏或密或枯或润的字，共同成为画面的一部分，也留下一个人的气息。

我甚至觉得，他写字和画画，用的是同一种方式——能少一笔，便不多一笔；能够沉默，便急于解释。于是，看他的字，也像看他的鸟与石。真正留下来的，不只是形式，而是一个人的性情。

八大山人画中的孤独，也并不是为了制造某种审美情调。那首先是一种生命经验。一株孤松为什么能够撑起一幅画？或许因为真正支撑它的并不只是树干，而是画家自己的生命。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，可能需要很多语言向世界解释自己；经历得足够多以后，也许只需要画一块石头。石头不说话。但它在那里。四百年以后，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重量。

这也是为什么伟大的艺术如此难以模仿。我们可以学习八大的构图，可以模仿他的鸟、他的鱼、他的荷，可以临摹他的笔墨与书法。但最难复制的，是一个人为何必须这样画、这样写。技法可以学习，生命无法复制。

次日，我又去了青云谱的八大山人纪念馆。如果说在江西省博物馆，我面对的是已经进入艺术史的八大山人，那么走进青云谱，看到梅湖的水面、树木与幽径，我

感受到的，却是一个曾经真实生活过的朱耆。风从湖面吹过，树影落在水中。再想起展厅里那些荷、竹、鱼、鸟、石头，它们忽然不再只是纸上的题材。一个人曾经在这样的草木山水之间生活，看树，看鸟，看鱼，看荷，也看自己的时代。

离开八大山人纪念馆时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院中的树木。风吹过，枝叶微动。我想起展览中看到的那句诗：“我与松涛俱一处，不知身在白湖边。”八大山人曾与师父弘敏在山林间诗歌唱和。松涛、烟林、山水、草木，对他而言从来不只是绘画题材，也是生命安顿之所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第三次回到展厅时，已经不再急着拍照。第一次，我看见的是他的画。第二次，我开始看见他的笔墨。第三次，我似乎才隐约看见那个站在笔墨后面的人。

这些年因为拍纪录片、策展和写作，我越来越相信，有些作品不能只在画册和屏幕上认识。尤其是中国画。印刷品上的墨只是“黑”，真迹里的墨却有浓淡、枯润、疾徐；手机屏幕上的留白只是一块白色，而当一幅真正的画悬在眼前，人与纸张、笔墨、尺度之间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关系。

所以，我想去看看。看看一枝荷如何从四百年前的墨色中生长出来。看看一只白眼向天的鸟、一尾游鱼、一头孤鹿，如何停驻在大片空白之中。也看看，一个人的孤独，如何穿过四百年的时间，依然抵达今天的我们。也许看八大山人，并不需要寻找答案。只是站在那里。看一笔墨，一块石，一尾鱼，一只鸟。然后，也看看自己。

四百年前，八大山人把世界刷到只剩寥寥数笔。四百年后的我们，面对一个越来越拥挤的世界，或许反而可以从他的笔墨里重新学习一件简单而困难的事情：知道什么值得留下，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。

寥寥数笔，何以抵达四百年？或许因为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，从来不只是笔墨，而是笔墨背后，一个人曾经真实活过的生命。



第 2392 期
邮箱: cuilan1972@ sina. com
电话: 0791-86849202

红色印迹

当风吹过赣南

□ 宋海峰

在这样一个秋日，我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县。

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，一件件旧物在灯光下泛着静穆的光：草鞋、军衣、盐包、弹壳、油印传单……俯身靠近，仿佛能听见1934年秋天的风。那风从赣南山谷深处吹来，穿过田埂、祠堂与村口老樟树，裹挟着硝烟与赤诚，漫过中央苏区最艰艰的岁月，直抵今人心房。

风掠过纪念馆大厅两侧的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作战经过要图，掀起历史帷幕。毛泽东1961年会见外宾时说：“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，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，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。”

1934年的赣南，风是凝重的。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“围剿”，博古、李德全盘否定毛泽东前几次反“围剿”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，起初推行“两个拳头打人”“分离作战”的军事冒险主义，与敌军硬拼决战；失利后又陷入防御保守主义，前线战局节节败退，红色政权岌岌可危。

毛泽东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屡献退敌良策，但都被“左”倾领导者束之高阁。即便如此，他仍亲赴前线督导战事，竭力减少红军损失，以赤胆忠心与坚韧毅力，诠释了党义的绝对忠诚。

伍修权在《我的历程》中回忆：“1934年春，李德就曾同博古说，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。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，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，只准备到湘鄂西去，同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……”

展板上的文字清晰记载：战略转移的最初决定，于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。彼时广昌已失守，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，形势万分危急，中央书记处遂决定主力红军撤离，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。接到复电后，苏区党政军领导人怀着沉重而紧迫的心情，为战略转移日夜奔忙。

纪念馆里陈列着洛甫在《红色中华》发表的《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》，这是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，朱德、周恩来署名的长征行动命令，红军总政治部的政治动员令，在风中凝聚起转移的力量。

遥想当年，中革军委派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，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前往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，创建新苏区——用周恩来的话说，“一路是探路，一路是调敌”。

更有一场隐蔽战线的生死谈判，为中央红军突围打开了生命通道。《何长工传》记载，1934年9月，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保存实力，暗中向红军传递合作意向，周恩来、朱德热忱回应。10月初，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具有丰富隐蔽斗争经验的潘汉年，奉命作为全权代表，携带周恩来起草、朱德签署的书信，前往粤军第七师驻地筠门岭谈判。

谈判在极端秘密中持续三天三夜，最终达成五项协议：就地停战、互通情报、解除封锁、互通商、必要时互相借道（红军行动事先告知，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）。当潘汉年接到“你喂的鸽子飞了”的密语电报（暗示红军即将转移），二人沉着应对，顺利返程复命。这场谈判的成功，为中央红军突破第一、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关键条件。

风很硬，山很沉，承载着别离的重量。转移前夕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苏区的党政军机构进行了系统性调整与重组，成立了由项英、瞿秋白、陈毅、陈潭秋、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、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，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、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陈毅为办事处主任，统一领导苏区武装掩护主力转移、坚持斗争。而毛泽东带病专程前往于都察看地形，选定突围路线，正如时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后来回忆：“中央红军安然地过了于都河，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。”

中央红军长征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述，将我带回长征出发前的筹备岁月。彼时中央苏区被层层封锁，粮食、药品、盐、弹药极度紧缺，而苏区军民的心，却在风中紧紧相连。人民群众几乎把能筹到的一切都送给红军——他们知道，这支队伍要去找一条能让革命进行下去的路。

风里飘着稻谷的清香，风里缠着针线的细密，风里更激荡着“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”的誓言。村口老樟树下，“父母送儿上前线，妻子送郎上战场”的场景动人心魄。青年们将“胜利”二字刻进眼眸，出发前的点名声短促有力，如风中火星，照亮沉沉黑夜。

客家妇娘们在油灯下编好的草鞋，稻草、布条、麻绳交织，鞋底坚实，鞋尖微翘，像蓄势待发的小船。它们即将走过山，蹚过水，踏过雪，把一个个年轻的脚印，印在二万五千里信仰之路上。苏区人民“最后一碗米当军粮，最后一块布做军装，最后一块板当担架，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”的赤诚，化作风的底色，成为长征精神最深的根基。

站在“长征第一渡”——于都县城东门渡口，风与涛声相拥，红色记忆在风中苏醒。当年的于都河宽达600余米，水深浪急，8个渡口中共5个需架浮桥。沿岸群众几乎捐出了家中所有门板、木料，在30公里长河段架起5座横跨400余米水面的浮桥。

风里传来原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在《长征路上第一桥》中的记述：有位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，当即扯断未熟的南瓜藤，拆了瓜棚扛去河边；一位老大爷，更是将自己准备的寿材亲自送到架桥现场。周恩来那句“于都人民真好，苏区人民真亲”的感慨，随风吹了92年，依旧温暖人心。

“红军抗日事长征，夜渡于都溅溅鸣。”1934年10月中下旬，中央红军主力在萧瑟秋风中星夜渡过于都河。红旗猎猎，草鞋踏过浮桥的声响，与风的鸣咽、水的潺潺交织，奏响了万里长征的序曲。那蜿蜒二万五千里红飘带，是风托举的信仰之路，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。

当风吹过赣南，它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气流，而是历史的信使，是精神的图腾。它低语着：长征精神从未远去，它藏在这红土的风里，永远吹拂，永远激荡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，在新长征、再出发的征程上砥砺前行。